

# 人民和历史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新阶段。在一众传播者中,戴季陶赢得了陈独秀等人的赞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际,戴季陶却临阵退出了。戴季陶退出中共建党的关键原因是,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既赞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使得他与人民渐行渐远。其后,他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最终沦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国民党人。戴季陶所构建出的一整套反共理论,在现实中屡屡受挫。1949年2月,眼看共产党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陷入理论和人生双重迷茫的戴季陶,用70粒烈性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证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巨大的勇气乃至牺牲。在建党后的28年里,无数革命先烈为坚守信仰献出了生命。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名可查及其家属受到优待待遇的烈士有370多万人。

但是,也有人背弃了信仰。譬如周佛海,他曾留学日本并考取了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精通日语和日本政情的周佛海应邀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及广东大学教授。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投机分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出于对金钱、权势的崇拜,周佛海很难保持对政治信仰或组织的忠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达。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而脱党。但是,他脱党不改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即使在白色恐怖中,也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古往今来,许多社会革命的组织者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依靠谁”的问题。例如,围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分配,洋溢着“均田”精神的社会主义口号推陈出新。但是,这些土地纲领往往停留在文本层面。只有中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一以贯之,据此形成的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这是中共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不仅清晰地认识到“依靠谁”的问题,还能很好地处理“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

举例来看,洪秀全准确把握了“依靠谁”这个问题。太平天国无论是动员口号,还是以天王法令形式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都贯穿着“均平”的思想。然而,在建立政权后,太平天国不可抑制地趋向封建化。以洪秀全为首的群体摇身一变成了权贵,政权内部产生严重裂痕。

又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中进行了明确表达。然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这个土地纲领的理论适用范围甚至没有超出城市。孙中山的主张没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他所领导的革命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再来看汪精卫。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期间加入了革命派行列。1910年,他赴京刺杀摄政王,入狱后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先后参加护法运动和国民党的改组。

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在孙中山逝世后逐

渐公开化。1926年3月,由于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利,汪精卫被迫辞职出走。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革命资历远逊于汪精卫的蒋介石,通过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得以上位。这导致汪精卫的心理严重失衡。于是,他如法炮制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投靠帝国主义,还将屠刀挥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此后,背弃人民的汪精卫一步步沦为叛国巨奸。究其原因,汪精卫始终无法领悟民主革命“为了谁”的真谛,从而迷失在对权力的追逐中。

反观中共,早在苏区便着眼于土地分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将“依靠谁”和“为了谁”有机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实施“减租减息”,为的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见,中共对“我是谁”的理解是日趋深刻的,在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础上,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表明,单一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并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开始,废约运动兴起,开启了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新潮流。

诞生于这股浪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践行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时,义无反顾地将民族解放大

任扛在肩上。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然而,面对利益的巨大诱惑,国民党人的反帝决心却动摇了。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投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怀抱,任其差遣。“九一八事变”中,坐拥三军的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甚至荒唐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

表面上看,“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经济内迁运动为中国保留了有生力量。但需要看到的是,当时能够内迁的产业、文化设施以及民众数量是有限的。而东北沦陷后,日本使役百万劳工,并对煤矿等重要军工资源进行了杀鸡取卵式的强取豪夺。蒋介石牺牲东北的人口、资源来换取时间的做法,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战略上更是值得推敲,也脱不了政客服务于金主的嫌疑。

同时,“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削弱东北军的阴谋。自跻身政界以来,蒋介石就惯用“借刀杀人”的伎俩来打击异己。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支持让蒋介石得以险胜。但战后,东北军也一举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二大军事派别,是蒋介石所谓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

由于在实力和道义上都很难以通过武力来解决东北军,因而“借刀杀人”成为不二选择。迫使张学良“不抵抗”并撤出东北,不仅使其声名狼藉,而且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在数量上也出现了腰斩。从结果上看,中国丢了东北,蒋介石却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东北军这个心头大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抉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欢欣雀跃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甚至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但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予以正确分析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出周恩来从中斡旋。

总之,中共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才能在一次次艰难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人民群众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摘自《解放日报》)

## 拉昂之战：拿破仑惜败退位

提及拿破仑军事生涯末期的战役,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和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而在这两者之间还发生过一场拉昂之战。法国皇帝拿破仑正是在此战后丢掉了法国首都巴黎,并宣布退位。

### 未能实施的关键计划

1813年11月,莱比锡会战结束仅几周后,受挫的拿破仑带领不到6万名士兵返回法国。12月20日,反法联军兵分两路越过莱茵河,分别是由施瓦岑贝格元帅率领的波西米亚军团,以及布吕歇尔元帅率领的规模较小的西里西亚军团。

两路联军的目标都是巴黎,但推进并不坚决。敌人的犹豫和分兵,给了拿破仑喘息的机会,他连续4次击败了布吕歇尔麾下的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不过施瓦岑贝格迅速渡过了塞纳河,使得拿破仑不得不转而阻击波希米亚军团。

1814年2月17日,率领5.5万人的拿破仑在巴黎东南成功阻击了施瓦岑贝格,尽管后者的军团有12万之众。两位联军元帅间发生了争执:出于对拿破仑“习惯性”的畏惧,施瓦岑贝格打算退过莱茵河,而布吕歇尔则坚决主张继续前进。

发现联军动向后,拿破仑准备将敌人各个击破。他本来准备绕到施瓦岑贝格的右翼,从后面打击他。实施侧翼包抄,是这位战争大师所擅长的战场机动,如果立即实施,对反法联军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拿破仑忽然改变了主意,决心继续追击布吕歇尔,这是因为他太重视巴黎了,而布吕歇尔这路军队对巴黎的威胁更高。

### 马尔蒙在哪?

法军前卫部队于3月7日击败了布吕歇尔麾下的一路俄军,而布吕歇尔则将主力部署到了小城拉昂附近。拉昂对拿破仑十分重要,拿下此地,便可以化解布吕歇尔对巴黎的威胁,还可以一举切断两路敌人之间的交通线。

联军入境法国以来,面对拿破仑简直是闻风则退,这让拿破仑又恢复了以往的极度自信,他在3月8日竟然把自己并不雄厚的兵力一分为二,自率3.7万人的主力取东北方向去拉昂,而马尔蒙元帅率约1万人从西北方向去拉昂。拿破仑认定当面只有敌人的后卫部队,事实上,布吕歇尔在拉昂有近10万大军和600门

火炮。拿破仑在8日晚间开始进攻,浓雾笼罩了整个战场,战至9日上午11时,雾气才开始散去,布吕歇尔俯瞰战场,吃惊地发现当面的法军方阵非常稀薄,他担心法军的主力将会从另一个方向攻来。游骑兵也报告,有一支“强大的”法军纵队正从西北面逼近。

布吕歇尔的反攻本已遏制住拿破仑的势头,但很快又转为集中力量防守。因为布吕歇尔对拿破仑的用兵困惑不解,他怀疑法军还存在“第三路纵队”。

此时,拿破仑已派出好几波传令兵,要马尔蒙加快步伐,但所有信使或被联军骑兵抓获,或被迫得落荒而逃。马尔蒙派出的信使,也是如此。在此情况下,拿破仑只能假设马尔蒙已经不远,因此继续加强对布吕歇尔右翼的进攻,以诱使后者从左翼抽调支援部队,这样一来,突然进攻敌人左翼的马尔蒙就大有希望建功了。

但在下午15时后,马尔蒙先头部队才与布吕歇尔军接触。布吕歇尔派出大规模骑兵迎战“法军主力”,马尔蒙自知不敌,退却观望。由于距离过远,加上风向的影响,拿破仑没有听到马尔蒙方向的交战声。

### 联军袭营的胜利

夜幕降临,布吕歇尔从抓获的俘虏口中,获知了准确的信息。入夜时分,布吕歇尔派大军偷袭了马尔蒙纵队。10日凌晨2时,拿破仑终于得到了来自马尔蒙的战报,得知其损失了3500多名士兵。一般的统帅会气馁,但拿破仑就是拿破仑,他有了新的推断:假设布吕歇尔会以一部兵力追击马尔蒙,那么留在拉昂的部队势必变弱。

3月10日天亮后,兴奋的布吕歇尔下令全军追击法国人,但很快发现拿破仑竟然保持了阵型,还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布吕歇尔立即下令采取守势,新的交战开始。

拿破仑观察着战场,发现布吕歇尔的主力仍留在拉昂,而没有追击马尔蒙。他很清楚,继续战斗下去已无意义了。法军的撤退从18时开始,而布吕歇尔也不愿在天黑后冒险展开追击。听闻布吕歇尔取胜后,施瓦岑贝格也恢复了进攻,拿破仑数次反击全都失败。3月31日,马尔蒙在巴黎投降;6天后,拿破仑宣布无条件退位。

(摘自《军事文摘》)

## 周恩来劝阻民主人士入党



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既是民主党派,又是共产党员,人们称之为“交叉党员”。这一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 民主人士入党有两次高峰

“交叉”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一些共产党员就参与帮忙成为领导或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在1949年后,纷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证。另外,老一代民主人士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很多人把入党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后有两波高峰:一次是1957年前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第一次高峰的背景,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党;二是反右斗争后,部分民主人士觉得不管地位多高,必须有政治保护色;三是共产党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吸收大知识分子入党。1957年,化学家侯德榜、唐敖庆就入党了。侯德榜既是著名化学家,又是民族资本家代表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他的入党影响很大,他还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随后,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物理学家钱学森、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也几乎同时入党。

### 周恩来说“都入党了没有意思”

1960年11月5日,周恩来约请党外部长座谈。当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讲到有李四光、李德全、侯德榜、陈其瑗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七八位写了申请书时,周恩来说,“都入党了还行?!那我们今天就变成开党代会了”。后来他

提出,都入党了,还有什么多党合作?要劝说老代民主人士留在党外,说是“都入党了,没有意思”。他对史良(民盟中央主席)说,党内有邓大姐、蔡大姐(指蔡畅),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周恩来极力劝说史良做一个“非布尔什维克”。1958年,茅以升、严济慈都想入党,也被周恩来劝止。

“文革”之后,又出现了民主人士入党高峰。1983年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县、市政府领导的人,到1985、1986年大约有70%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高峰的背景是,有关部门提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老代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坚持共产党的事业为理想。

“交叉党员”一度在民主党派中占相当比重。而“交叉党员”在政协、人大的议席都统计在民主党派内。八届政协时2012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交叉党员”220名,在实际上改变了文件规定的党内外比例,引起民主党派某些领导的不满。

### 难挡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

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中共中央决定,劝说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级领导人,不要参加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还下发过两个《意见》,但还是挡不住一些老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

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彭迪先还曾为人党的事找过杨尚昆哭诉:“留在党外,我能理解,但家里人理解,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不然怎么入不了党?”没有办法,就入党吧。

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裴昌会,他是1947年3月攻占延安的军长。这位曾经为蒋介石“雪耻复仇”的将军,也于198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汤元炳,在1997年逝世前申请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了其入党请示。

在这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有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罗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严济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有的民主人士生前留下遗言,要求在身后追认为共产党员。这类追认多了,在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中央组织部于是表示,在控制民主党派负责人入党的同时,对一般情况下,正常逝世的党外人士,不要追认为中共党员。(摘自《新周报》)

祥生西江樾 SHINSHUNJIYANG 中国地产 TOP 28

# 壹千变壹万 宅家赚现金

有效期: 2020年2月21日—3月31日

- 1: 缴纳1000元,即可锁定一套意向房源
- 2: 拟定房源专享“一口价”优惠政策
- 3: 推荐成交房源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
- 4: 拟定房源非本人推荐成交,退本金再额外享500元礼品
- 5: 拟定房源活动期间未成交,无息全额退还1000元(请及时联系销售人员,限时限量,抓紧时间!)

0531 81176688 臻选中心 新光大路与进贤路交汇处东南角